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受暴女性為何無法脫逃？—從「家庭暴力」到「高壓控管」

Why Don't Victim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Leave? From Physical Abuse to Coercive Control

doi:10.30074/FJMH.201512_28(4).0001

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28(4), 2015

Formosa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8(4), 2015

作者/Author：鄭詩穎(Shih-Ying Cheng)

頁數/Page：481-497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5/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074/FJMH.201512_28\(4\).0001](http://dx.doi.org/10.30074/FJMH.201512_28(4).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受暴女性為何無法脫逃？ —從「家庭暴力」到「高壓控管」

鄭詩穎

研究目的：阿靜為作者服務的家暴個案，她在接受服務過程中的反覆態度、對社工的拒絕，深化作者對親密關係暴力、以及社工處遇的認識與省思。因此，本文以「個案報告」形式，陳述阿靜的受控處境、求助歷程，並與長期研究家暴議題的學者Evan Stark提出的「高壓控管」(coercive control)理論對話，希冀藉此提供關心家暴議題的人士參考。**研究方法：**透過案例討論，從作者服務親密關係暴力個案的經驗著眼，分析個案阿靜的受暴處境，以及她在社工與網絡服務歷程中面對的困難。**研究結果：**Stark的「高壓控管」理論貼切解釋個案阿靜的受暴處境，加害人的嚴苛控管使阿靜有如驚弓之鳥，不僅難以擺脫傷痕累累的關係，向正式體系的求助也遭阻斷，本文以「性別陷阱」、「專屬權信念」、「孤立與社會隔離」三點進行分析。**研究結論：**台灣家暴防治社工服務目前對家暴事件的介入，多以保護令與報警等處遇方式為主，使得在實務上，社工或其他網絡成員(警政、衛政)傾向重視「看得見」的肢體暴力，而忽略精神暴力、嚴苛管控等受暴處境。針對此現象，Stark分析，外界與服務體系習慣以「暴力事件」為指標，視而不見控管關係中「連續、反覆出現」、「以剝奪受害人自主性為目的」等關鍵特質，使得專業人員難以深入理解控管關係對受害人的影響，從中發展有效的協助策略。本文採「個案報告」形式，探討家暴個案阿靜的求助歷程，並與Stark的「高壓控管」理論對話，希冀深化對親密關係暴力本質、與相關處遇的認識。

關鍵詞：親密關係暴力、高壓控管、家庭暴力

鄭詩穎：前現代婦女基金會社工員；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社會工作博士生；專長領域與研究興趣為親密關係暴力、女性與遷移、反壓迫社會工作。(E-mail: shih-ying.cheng@wustl.edu)

收稿：2015年01月26日；接受：2015年12月15日

一、阿靜的故事

去年3月，阿靜的丈夫政偉因疑心阿靜¹外遇，對阿靜拳打腳踢，阿靜報警求助，倉皇離家。

我接獲通報表後²，立即連繫阿靜。阿靜說，她不想再忍耐了，想與政偉離婚，已經開始談協議離婚。但後來，我開始聯絡不到阿靜，原本約定的面談她也沒有前來。

過了一個月，政偉又對阿靜動粗，阿靜再次求助，希望可以尋求庇護住所，我於是為阿靜轉介庇護家園。經過庇護家園社工電話評估，阿靜確定可以入住，也與家園社工約好了入住時間。但從當天中午考量到下午傍晚，阿靜的態度又轉變了，她決定不住家園，只要到離夫家不遠的娘家暫住一晚，恢復身心。

我尊重阿靜的決定，但也表達對她的關心，又與阿靜約了要在阿靜娘家面談。但是，到了約定的那天，阿靜沒有出現、去電不接，阿靜的父親協助我聯繫阿靜，得到「今天家裡有事，不能過來」的答案。返程路上，阿靜突然來電，冷靜地告訴我：「希望可以終止服務關係，不需要社工再協助，現在的問題透過夫妻溝通就可以解決，政偉也沒有再打，不要浪費社會資源」。

當時，作為一個投入家暴防治工作沒有很久的新手社工，我不解自己做錯什麼，也不知道應怎麼面對阿靜的拒絕，是不是應該要遵循「案主自決³」的原則，尊重她現在的決定，先結案⁴、不再打擾她。但同時，我又隱約感到阿靜很像典型的受

¹ 為保護個案隱私，文中所提到的姓名均為化名。

² 我的工作是家暴防治社工。依目前台灣的家暴防治體系之運作，警政、醫療、社政均有強制通報家暴義務，若上揭單位發現家暴受暴個案，需進行線上通報、或傳真通報表至地方政府之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家防中心將視案件類別與行政區域進行派案，委請委外單位社工提供受害人相關服務與協助。在我的單位，工作流程是由督導統一收受通報單，再派案給不同的社工員。

³ 案主自決原則是社會工作專業的核心價值之一，意指案主有權利對自己的處境、面臨的問題做決定。

⁴ 成人保護中，案主的意願是個案服務的重要判準，本單位結案標準中，亦有一項準則為「案主拒絕服務」。

airiti
暴婦女圖像，覺得自己好像應該再堅持一下，嘗試瞭解她求助態度的反覆多變。

我開始不密集、比較「不威脅」（不談關係決定、也不談受暴狀況）地聯繫阿靜，關心她最近的生活狀況、關心她細碎的生活煩惱，例如：父母身體、公司排班狀況等，提供相關福利訊息給她。約兩三個月後，在某一次聯繫中，阿靜對我說，「之前對不起，當時先生在旁邊，所以她只好這樣說（指要終止服務關係）」。於是，我們開始約定「秘密暗號」，設定如果講到某些關鍵字，例如「你打錯了」、「這裡沒有這個人」，就代表政偉在旁邊。這個只有我們兩個知道的「秘密暗號」讓我感覺，我和阿靜的關係好像有點不一樣了。

再之後，我到阿靜工作的地方拜訪她，在她繁忙的工作縫隙，斷斷續續的閒聊。這次碰面，加上之前破碎的資訊，漸漸拼湊出一個比較完整的生活世界圖像。

二、嚴密控管，有如驚弓之鳥

阿靜和政偉結婚多年，有一子一女。阿靜的工作是基層服務業，工作時有時無，要視老闆需求與排班狀況。政偉的工作為承包性質，工時與收入也不固定，一直以來，阿靜家的經濟壓力並不輕鬆。

阿靜與政偉結婚後，政偉經常懷疑阿靜與其他男人有曖昧關係，常因此爆發衝突。同時，政偉對阿靜的生活嚴密控管，阿靜的存摺、提款卡從很久以前就被政偉扣住，她拿到薪水要全數交給政偉，以讓政偉統一分配，需要買菜或添購家庭用品時，政偉才會給阿靜幾百元。因為政偉的善嫉，阿靜為了「避免麻煩」，在決定上工前，她會先徵求政偉的同意、甚至邀請政偉陪同應徵，經政偉評估許可才會就業。此外，政偉也會不定期查看阿靜的手機、透過家裡的監視器裝置監看阿靜，或是不定時地到阿靜工作地點查看，使得阿靜不管在哪裡，都很像一隻「驚弓之鳥」，常常都透露著「這裡不要講太多」、「噓，小聲一點」、很想趕快結束會談的神態，這樣的神態，即使是在阿靜工作的地方，都十分明顯。

雖然如此，面對幾乎沒有品質的婚姻，阿靜仍心心念念要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希望孩子在有爸爸、有媽媽的家庭中長大成人；同時，擔心自己的經濟能

airiti

力，沒辦法獨自扶養孩子長大，阿靜選擇體諒政偉的善嫉、暴力，以政偉的母親曾有出軌行為、背叛政偉父親，來解釋政偉的嫉妒猜忌、以及加諸在她身上的種種規定。面對自己的情緒、感受，在會談中，阿靜也總是以「好了，現在先不要再說了」來止住快要流出的淚水。彷彿如果談得太深，就會像打開潘朵拉的盒子一般，太多真實的感受傾瀉而出，一時半刻，叫她該怎麼處理？

三、重新理解阿靜：受困於暴力處境

阿靜的故事在家暴防治的工作中應該不算陌生：受害人態度撲朔迷離、不信任服務系統，在嚴密管控的縫隙中，對外求助顯得困難重重。然而，台灣的家暴防治體系，是否能成功地承接、協助這類特質的受害者呢？

1993年起，在民間團體以及法界專家的倡議與推動下，透過考察、擷取美國及其他英語國家的經驗，有識之士著手起擬〈家庭暴力防治法〉草案，於1998年三讀通過亞洲地區第一部家庭暴力防治專法。於刑事部份，明文定義「家庭暴力罪」，提供檢警司法單位進行家暴防治的介入方法；民事部份，則賦予家暴受害者聲請「民事保護令」的權利；此外也規範設置中央主管機關，統籌家暴防治相關業務(高鳳仙，1997；陳秀峯，2010；潘淑滿，2003)。

〈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立法不僅革命性地挑戰台灣社會「法不入家門」的傳統觀念，隨之帶動建構台灣的家暴防治體系與服務，其並奠定了台灣家暴防治介入工具的基礎，亦即可透過保護令制度、預防性羈押、加害人處遇計畫等工具，保護家暴受害人。除此之外，台灣家暴防治制度的建構，並欲整合醫療、警政、社政、教育與司法等資源，期能提供給受暴婦女完善的多元服務內涵。這樣的介入取徑，與美國近代對伴侶暴力的回應，強調強制逮捕、起訴、責付加害人處遇的司法面向處遇模式(Stark, 2007)有所不同。

司法提供受暴婦女人身保護令、法律訴訟等工具，增強人身安全，是從公權力層次宣示，婦女人身安全保障為國家保護人民的範疇：即使在私領域的家門內，女性也有免於恐懼、免受暴力威脅的權利，若發生家暴事件，政府有介入與協助的

airiti

正當性，無疑十分重要。然而，如果只著重法律工具的介入取逕，在實務上也可能容易使得社會工作者與網絡工作成員，為要取得聲請保護令的「證據」，養成較重視「看得見」的肢體暴力、與「暴力事件」的習慣，進而容易忽略無所不在、連續性、反覆出現的精神暴力、與嚴苛管控的受暴處境。

台灣的狀況雖與美國不同，對比美國對強制逮捕、起訴、責付加害人處遇等司法處遇流程的強調，台灣較偏社福整合取向(此點可自家暴工作由社政主管推論得知)，期待透過不同資源、服務網絡的整合，提供受暴婦女更多元、完善的服務。然而，或受限於資源有限、人力流動、網絡的合作默契、網絡成員的專業敏感度等因素，要能提供綿密多元的協助，發展更精緻的安全策略，往往並不是這麼容易。實際上，社工、與家暴防治網絡成員仍常僅著眼司法與警政流程。也因此，雖然美國與台灣的家暴體制發展、社會脈絡、主要處遇模式均不盡相同，長期研究家暴議題的學者Evan Stark，針對美國家暴防治體制提出的針砭與洞見，對台灣目前的服務發展困境，仍有其重要參考價值。

Stark(2007)以「家暴司法化」形容家暴防治的發展歷程，他指出，美國家暴防治體系走到今日，雖然已發展出許多工具讓受暴婦女保護自己，例如庇護所、家暴保護令，但這些作法多僅能保障受害人短期的人身安全。長期來看，除非能看見、並處理受暴婦女在日常生活中經驗的壓迫，否則仍難以協助受暴婦女獨立、獲得自由。同時，因外界與服務體系習慣以暴力事件為指標，而忽略高壓控管關係具有「連續性」、「反覆出現」、「以剝奪受害者自主性為目的」等關鍵特質，使得服務體系傾向假設在暴力「事件」與「事件」之間，受暴婦女有離開關係的可能性。因此，有時服務體系甚會進一步對這些婦女貼上標籤，質疑受害婦女「心理有問題」，否則，她們為什麼不離開？

他進而提出「高壓控管」(coercive control)這一概念來理解受暴婦女，不同於伴侶互毆(couple fights)或伴侶攻擊(partner assault)⁵，「高壓控管」是從「男人怎麼將女人陷入(entrap)受暴處境」這一視角出發，討論個別男性作為「性別優勢」群體中的一員，如何利用社會既有、對男性群體有利的性別意識，操弄各種手段(可約略分

⁵ 見註腳9。

成四大類：肢體暴力、威脅恐嚇、孤立、日常生活控管)，使女性陷入受暴關係、難以逃脫(Stark, 2007)。因此，他認為外界對受暴婦女的想像與疑惑是搞錯對象。應該質問的對象是男人不是女人，該問的問題是：「男人究竟用什麼手段將女性受困於暴力處境中，使女人難以離開？」而不是問女人「妳為什麼不離開？」

緊扣「受困」(entrapment)概念，Stark(2007)以「牢籠」比喻受暴婦女陷入的困境：想像一個女人每天穿著一樣的衣服，鮮少外出，侷促於一個狹小空間，如果不是身處囹圄，要怎麼理解、解釋這樣的現象？他耙梳文獻，類比「戰俘」與受暴婦女的共通性：加害者利用「鬆動」(unfreezing)、「改變」(changing)、「重構」(refreezing)的連續性策略，解構受虐者原本的認知體系，注入刑求者/家暴相對人欲建立的世界與自我觀。而除了上述一般性的描述外，他也進一步指出「高壓控管」的殊異特徵(Stark, 2007)：

1. 相對人的目的：在於奪取、主宰受害者的主體性。在控管關係中，相對人往往認為其對受害者有「專屬權」(privileged access)，有將受害者「所有權化」的傾向。
2. 相對人的策略使用：
 - (1) 相對人會利用對受害者的私密認識，以對受害者最有效果的策略，施展高壓控管。
 - (2) 高壓控管有「實驗」性質，透過不斷地嘗試與錯誤，相對人得以找出最有「效率」、最能「恫嚇」受害者的控管策略。
 - (3) 透過空間與時間的「控管延伸」策略(例如透過科技跟蹤軟體，掌握受虐者行蹤)，相對人不僅破壞受害者暗自經營的安全空間(safety zone)與抵抗策略，同時也精心營造自身「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形象，使受害者臣服於控管關係中，無法也不敢逃脫。
 - (4) 相對人會有意識地利用既存於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以及女性被賦予的性別角色(家務與照顧提供者、性伴侶)，將受害人持續隔絕於公領域之外，要求受害人讓渡財務決定權力與自己，以能從中獲利。
3. 對受害人造成的影響：不同於單次、偶發的暴力事件，連續存在的控管關係對受害者的影響有總和、加總的特質，使得受害者持續地處於受迫情境中。

airiti

對應阿靜的故事，「高壓控管」視角準確地解釋了她的困境，政偉的嚴苛控管使阿靜成了驚弓之鳥，不僅難以擺脫傷痕累累的關係，就連對外求助、尋求正式體系的奧援，對阿靜而言也並不容易。以下我分成「性別陷阱」、「專屬權信念」、「孤立與社會隔離」三點進行闡釋：

(一) 性別陷阱(gender entrapment)

Stark陳述，施暴者會有意識地運用父權社會中既存的傳統性別規訓，合理化其對受害婦女的控制，包括社會賦予女性的家庭責任、女性應「以家庭為前提」(domesticity)的信念、性別刻板印象等。針對這樣的現象，Stark以「性別陷阱」命名。

性別結構的推波助瀾在阿靜的受困中，有著或深或淺的痕跡。父權社會賦予男性伴侶對女性理所當然的佔有欲與貞操監控，使阿靜對政偉的種種控制行為理解為「善嫉」，而非「控制」。子女與「家庭」對阿靜的牽絆亦然，對阿靜來說，「有父有母」才是「完整的家」的家庭想像，使阿靜甘願禁錮於政偉構建的「家」的牢籠之中。阿靜的人格特質也是，她的堅忍不拔、收斂情緒是阿靜對「好女人」的想像內涵，也是她的自我規訓。這些根深蒂固的傳統性別意識，在阿靜受困的處境中作用，使得阿靜不自覺地合理化自己的處境、與政偉在關係中的控制。

這些特質並非阿靜獨有，實務經驗中，許多家暴受害人都有雷同的詮釋與想法，「我要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因為他嫉妒心比較強才會這樣」、「也還好啦，習慣就好了」都是很常聽到的被害人陳述。如同Stark的分析，相對人會有意識地利用既存於社會中、不平等的性別結構，合理化對受害人的控制行為。另一方面，我也發現，除了加害人的操縱與運用，身陷於「性別陷阱」的受害者，也常傾向以傳統性別規訓合理化加害者的控制行為。

(二) 專屬權(privileged access)信念

專屬權信念，是Stark論述中很重要的一環。他認為，相對人各樣脅迫控制手段的主要目的，是奪取、主宰受害者的主體性，實踐相對人對受害者有「專屬權」、

「所有權」的信念。「性專屬權」也涵括於此概念下，加害人傾向認為自己理所當然有獨佔受害者的性與身體的權利(entitlement)。Stark認為專屬權信念最能解釋「為何控制行為會一再延續？」此詰問，即便親密關係結束，一旦加害人認為其對受害人有專屬權，控制手段就難以終止。

對照阿靜的受暴經驗，政偉對阿靜貞操的監控，對其生活行蹤、工作選擇、財物花費、交友狀況、對外求助的掌握，顯示政偉透過各樣手段實踐對阿靜的「專屬權信念」。阿靜之於政偉，並非一獨立自主的個體，而是理所當然受其支配的(性)附屬。此外，阿靜的經驗也揭露加害者的「專屬權信念」如何影響受害者，侵蝕其主體性。政偉的種種監控手段，一滴一點的改變、模塑阿靜的行為模式，使她的每個行動與選擇，逐漸偏離自身的偏好、選擇，而是歷經一連串的自我審查過程：「如果我這樣做，他會怎樣？我會不會更麻煩？」。因著害怕政偉的暴力回應，阿靜對自身選擇與行動的評判標準，不再是自己的福祉，而是政偉的反應。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阿靜的工作選擇，自身興趣、能力、未來發展不是她的考量，阿靜的職業選擇，建立在政偉「同意」、不會引發他嫉妒的基礎上。在這樣的過程中，阿靜的主體性一滴一點地流失，政偉對阿靜的「專屬權」，相對地，一寸一方地劃界。

(三) 孤立與社會隔離

阿靜的案例中也能觀察到政偉對阿靜的孤立策略。在阿靜過去的經驗中，不管是對外求助、警政約制告誡、或與社工連繫，都在被政偉掌握到行蹤後，對阿靜嚴重施暴。因此，為避免政偉發現而對自己造成安全威脅，在危機事件過後，阿靜往往傾向選擇明快地向警察、社工改口說明家裡沒有無問題、不需要幫忙，以保全自身安全。

與阿靜談到她「拒絕社工服務」的那一天，她說，政偉當時要求她把手機開到擴音，她心想，眼下「只能得罪一方，所以只好這樣對妳說」。聽阿靜這樣說，我才了解，阿靜對體系與社工的拒絕，其實是她維護自身安全的策略，是她對政偉「輪誠」的展演：既然沒有要離開政偉，政偉又因對阿靜行為模式的把握，不怕體系的監控，她只好以拒絕體系，換取短暫的安全，但是，當她選擇這樣做時，也使

自己陷入了更被隔離的處境，隔絕於專業助人體系之外。

阿靜幾年前就曾通報進案，先後被多位社工服務過，期間更曾出現過兒子受暴，兒保社工⁶的介入促發政偉對阿靜狠狠施暴、控制她的人身自由等狀況。於是，阿靜漸漸養成對體系傾向不說太多的習慣，以及對防治體系的排斥態度，因此，阿靜雖從多年前通報進案，卻一直難以被深入瞭解、進入長期服務歷程，使得社工傾向在離職時結案，而非轉介其他社工續處，最後造成阿靜一再進案、由不同社工服務的狀況⁷。

另一方面，對比阿靜對防治體系的退縮，政偉則是積極地向網絡成員整飾形象。103年3月通報事件後，由於阿靜為「高危機個案⁸」，警局家暴防治官依規定進行約制，在後續與社工的討論中，家防官形容政偉「文質彬彬、很有禮貌」，反倒認為阿靜說詞反反覆覆，講的都是「以前受暴的狀況」，通報當天說的是一套，過幾天說的又是另個版本的故事，是個「奇怪、有問題的女人」。一來一往之間，阿靜在家暴體系監控中節節敗退，成為「奇怪、有問題、難工作的求助者」，而政偉，反倒贏得了警政的信任。

對照Stark對相對人策略使用的分析：相對人會透過空間與時間的「控管延伸」策略，破壞受害者經營的安全空間與抵抗策略，同時營造自身「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形象，使受害者臣服於控管關係中，無法也不敢逃脫。阿靜經驗的孤立與社會隔離，符合Stark的觀察，即使鼓起勇氣對外求助，政偉在家防官面前的形象經營、對阿靜與防治體系關係的破壞、對阿靜的監控的強化，在在摧滅阿靜好不容易萌生的小小抵抗，使她不斷陷入更孤立、隔離的處境，同時也讓阿靜再次體認：她逃不出這個牢籠。

Stark書中有一案例故事，我的印象特別鮮明(Stark, 2007, pp. 209-210)：婦女

⁶ 台灣的家暴防治，採一個受害人一個社工的制度，若同一個家庭有多人受害，則可能有不同社工介入服務。

⁷ 當然，社工的流動又是另一個可探討的議題。

⁸ 針對親密關係伴侶暴力，目前家暴防治體系採用「臺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TIPV-DA)」(王珮玲，2012)，自家暴受害者受暴歷史中，進行個案危險評估，量表總分超過8分、或經通報人員專業評估為「高危機」，即為「高危機個案」。

airiti

Kathy在經歷多年的受暴後，終於鼓起勇氣尋求法律協助、欲進行離婚程序。然而，就在Kathy求助的隔天，律師聯繫Kathy的電話遭丈夫祕密監聽。那天晚上，丈夫質問Kathy是否暗自規劃離婚，狠狠地打她一頓，丈夫告訴她：「我會知道，是因為我會讀妳的心」。令人難以置信地，Kathy竟然相信丈夫的宣稱，因為她怎麼想，都想不到丈夫得以透過什麼方式知道自已的計畫。經過此事，Kathy更加確認自己無處可逃，於是一個月後，她決定僱用殺手謀殺自己的丈夫。

Stark論述，只要加害者發現受虐者有一丁點的不同、抵抗、或是嘗試找尋自主的痕跡，就會大力撲滅。如此過程對受虐者的傷害在於，久而久之，因著受虐者過於害怕，自己私密創造的自主空間(stolen moments of autonomy)會被加害者發現，進而引發嚴重暴力，以致受害者傾向對自己的各樣想法、行動進行「預先的自我審查」，並且刪除、轉化那些可能會引發危險的想法，以避免進一步的受害。於是，因著長期受限、隔絕於社會之外，受虐者的認知系統，漸遭扭曲，逐步喪失理性思考與獨立判斷的能力。

從Stark的高壓控管理論回頭看阿靜的故事與求助經歷，阿靜對專業體系的拒絕、隱瞞、多變，頓時能被理解與解釋。警察與社工眼中的「不配合」其來有自，不是因為這個受害者「難搞」、「奇怪」、「人格有問題」，而是她在久經對外求助的嘗試、與許多努力後，經過評估、考量的人身安全策略選擇。

四、家暴防治體系的侷限

回顧至今的服務歷程，我曾向阿靜抱歉，過去的社工介入、警政約制似乎不僅沒有幫到她，反而造成了她的麻煩；也向她道歉，過去換了這麼多個社工，使得每次社工都要重新認識她。沒說出口的抱歉是，面對她現在的處境，似乎家暴防治體系並不能有效地協助他。

目前的家暴體系中，多以保護令、通報警察等方式為主要處遇工具，不僅政府的家暴宣導以此為主要焦點，社區網絡(警政、社政)的合作與協助也多以此為基調。不可否認，保護令、警政體系的約制告誡，確實能協助到部分家庭暴力被害人。然

而嚴重的「暴力事件」的並不會構成「受暴處境」⁹，關係中是否存在權力地位的不對等、是否有一方對另一方透過各樣策略脅迫管控，才是親密關係暴力議題的核心。

然而，在目前家暴防治體系的運作下，阿靜的求助卻似乎難以得到有效的回應，甚至因為警政的約制告誡使得阿靜的危機程度升高，接著，又因為政偉的監控與孤立手段，使得阿靜傾向拒絕體系，成為不積極、不合作、網絡人員口中的「奇怪個案」。

這印證了Stark的觀察，對「人身安全」的維護是美國早期家暴議題、庇護家園運動倡議者著眼的焦點。然而，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只考量安全是不夠的。家暴相對人的管控、脅迫、貶抑對受害婦女自主、尊嚴、自由的剝奪與傷害，難以被「安全考量」一一涵蓋。此外，在目前家暴防治體系中，由於強調法律工具的介入，家庭暴力被「事件化」，視為彼此無關、獨立的暴力案件；反之，他認為親密關係暴力中，關係脈絡以及權力地位，嚴密掌控的「總和」才應是被探究、與關注處理的重點。針對單一事件的個別處理，不僅難以進入受害者的主觀世界，理解她的日常生活，也很難有效地協助受害者。針對這樣的受暴處境，Stark認為「命名」是首先應當做的，接著，除了在司法體系中認知到受暴關係對受害者的「累加」效果外，扭轉性別刻板印象、改善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現象也需同時並進地努力。

五、慢慢長出自主性

服務阿靜的同時，我一邊認識高壓控管理論，在Stark的分析中對照她的處境、態度，深化對阿靜的理解。我和阿靜說，我支持她所做的決定，不管要離開婚姻、或是留在關係中，我都支持，我只希望她可以過得好。

⁹ Stark(2007)即將親密關係的伴侶衝突分成三類：伴侶互毆(couple fights)、伴侶攻擊(couple assault)及高壓控管(coercive control)，前兩者雖也有肢體暴力的存在，有時也可能重複發生或非常嚴重，但其與高壓控管的差異在於，上開肢體暴力為伴侶之間處理衝突與情緒的方法，並不涉及對人的權力控制，也不會剝奪受害者的自主性。

airiti

十個月，不算長的服務歷程中，我關心她生活上的煩惱(家人生病、經濟辛苦)，幫她找關於家人疾病的資料、協助申請經濟補助，盡可能地全方位協助阿靜，分擔她的苦惱，試圖在人身安全的關懷之外，拓寬服務，從一個整全的「人」的角度看待阿靜，而不只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漸漸地，我和她建立起信任關係，她也慢慢知道，她不是孤立一人，有需要時，有人可以在她身邊，支持她。

不知道是否是因為這樣的支持、以及這樣的支持創造出來的餘裕，阿靜開始有能量看清、分析自己在婚姻中的樣貌與處境：「他(指政偉)越來越奇怪，我沒有辦法和他白頭偕老，但我自己又沒辦法一個人養大小孩」；對未來，她也開始能夠構築一些想像：「再過5年，等兒子、女兒都成年，我對子女的撫養責任盡了，我就要離開，過自己的生活」；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阿靜長出勇氣做之前不會、也不敢做的事：她申請了一個新的、政偉不知道的銀行帳戶，儲蓄我為她申請的經濟補助，「為未來、為自己做準備」，阿靜這樣認定。同時，阿靜也越來越信任專業助人體系，遇到問題會請我幫她預約法律諮詢，一起縝密討論要怎麼瞞過政偉，順利外出、進行諮詢，對細節進行模擬與沙盤推演；遇到意外事件、臨時需要幫忙，生活心情遇到瓶頸時，阿靜也會來電，請求我的協助與意見。

慢慢地，阿靜的自主性漸漸長出，也開始從孤立的受暴處境，尋求外界的支持與奧援，這樣的自主性、以及對外界資源的仰賴與使用，讓阿靜有能量嘗試與政偉分化—例如，申請「自己的」銀行帳戶—即使不是馬上脫離受暴關係，至少，阿靜已經開始長出能量，嘗試與政偉分化。

如何與高壓控管個案工作、進行協助？實務機構透過集體行動研究¹⁰，整理個案受暴經驗、與社工員的服務經驗與工作方法(現代婦女基金會北區工作站、王增勇，2015)，或可於此提供參考：

該研究發現，協助高壓控管個案，必須採取「內外交替」的服務策略，重構案主內在的認知與強化內在能量，以打破受虐者與外在世界的隔離狀態，解構高壓控

¹⁰ 為提升服務品質以及對服務族群的認識，現代婦女基金會每兩年舉辦實務工作研究研討會，鼓勵社工進行實務研究。此研究集結多位社工分享案例與服務經驗，共筆書寫研究成果。阿靜亦為研究案例之一，阿靜在服務過程中反覆的態度，對網絡工作人員的拒絕，深化實務工作者對高壓控管案例、以及與網絡成員合作經驗的認識。

管牢籠，讓案主重拾自主、與社會再度連結。整理主要研究發現於下：

1. 從建立關係開始，社工要做的是「懸置理所當然的家暴視框」，理解服務關係中的矛盾，才能「如是的接納」案主，並對案主描述的親密關係細節進行「敘事的想像」。
2. 建立服務關係後，應於「內」促發案主內在質變，於「外」建構多元支持體系，發展兩個方向的處遇策略：

(1) 於「內」促發案主內在質變：

- a. 社工要協助案主理解自身的受控處境，以高壓控管正名。
- b. 因應相對人高壓控管策略中的「個人化」與「實驗性質」，與案主討論發展細緻靈活的安全計畫。
- c. 透過行動與分析，解構案主「介入無效」的認知，戳破相對人的「無所不能」形象。
- d. 幫助案主形成「界限」，與相對人分化。
- e. 協助案主身心照顧、重新定位自我，發展「我能感」與「內在獨立」的能力。

(2) 於「外」建構多元支持體系：

- a. 向網絡成員闡釋相對人的控管及操弄的策略，讓網絡成員理解案主受暴的脈絡，轉化網絡成員對案主的判斷與迷思。
- b. 結合正式與非正式資源，建構案主支持體系，破除案主的受控與孤立狀態。

反觀我與阿靜的工作歷程，於內，阿靜對政偉的控管策略越來越看得清楚，對其暴力使用的詮釋也正在轉變—從過度同理政偉，到肯認自己不應被如此對待。這樣的覺察促成阿靜成立「自己的」帳戶，儲蓄我為她申請的經濟補助，象徵著阿靜漸與政偉分化、重拾自主。於外，阿靜開始信任我，主動向我求助，代表阿靜已漸將助人體系當作自身的支持。雖然，阿靜的受控處境至今並無大幅度的改善，助人歷程也仍存有許多挑戰，然而對照阿靜一開始對體系的拒絕，阿靜現在的改變，已是讓人開心的進展，需要謹慎地握牢、增強。

六、從「肢體暴力」到「高壓控管」

阿靜從首次通報到現在，是近6年的光陰，無論是阿靜求助家暴體系、或是社工的服務，都經歷了不少虛耗與繞路。

基於現實考量(阿靜的就業與經濟狀況)、傳統信念(「完整的家」才是好)、界線不清(對政偉的過度同理)，阿靜關心的是關係維繫，社工關心的是人身安全。政偉綿密的控制、對外的形象經營，也讓她在體系與網絡中越來越被孤立、難被瞭解。

這樣的狀況並非家暴防治工作者願意見到的。然而，服務提供者也受限於體系結構與制度安排。目前台灣家暴防治體系注重事件；高度仰賴保護令、通報警察等處遇工具；責任通報、與案量高、工作人力少造成的案件壓力，使社工必須發展快速分類、進行評估與處遇的工作風格，以求有效率地完成繁重的工作。再者，保護性社工的工作重點本就在於危機處理與安全維護，加上處遇工具以保護令與通報警察為主等影響，自然容易傾向將暴力事件細節的蒐集、以及對暴力事件的因應，作為工作的重點，而回應案主的安全議題，又通常以聲請保護令為主要介入方式。因此，面對舉棋不定、反反覆覆，對網絡與社工介入消極因應的個案，很容易在這樣的過程中被篩掉－即使，撲朔迷離的求助態度常是受害者飽受暴力與高壓管控的結果。

Stark的高壓控管理論細膩地描繪「高壓控管」牢籠的特性、受陷處境，他對受虐關係樣態的描繪，更準確地解釋了阿靜的求助態度，也協助身為助人工作者的我有機會，貼近、理解阿靜，進而建立助人關係，使處遇不再只單薄地限縮在保護令或通報警察等工具，得以展開更多元、更貼近個案需求的處遇方式。

2015年1月，〈家庭暴力防治法〉完成立法實施後的第5次修法，此次修法，除了延長通常保護令效期、取消延長保護令次數的限制，將目睹家庭暴力的兒童少年納入保護令範疇外，更重新定義「家庭暴力」。修法擴充「家庭暴力」定義內涵，自原本的「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修正為「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2015)。換句話說，「高壓控管」的概念已被家暴防治體系看見、肯認、並納入法定的家暴防治範疇。這樣的修法方向在台灣目前的家暴防治體系，

提供了一個重要契機，讓社工與網絡成員有機會再思所謂「家庭暴力」中「高壓控管」的關係本質。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美國強制逮捕、起訴、命令加害人接受處遇等司法流程，台灣的家暴案件進入刑事司法程序所佔比例實際並不高。因此，Stark 批判「家暴司法化」的美國脈絡，與台灣經驗有所差異。只是，受限於社工的經驗能力、與案量壓力，使得台灣家暴防治體系中的社工處遇，在維護受害者人身安全這塊，常多僅以保護令、通報警察為主要處遇工具，而當這樣的工作方法無效時，黔驢技窮的社工多也疏於「懸置理所當然的家暴視框」，理解服務關係中的矛盾，進而未能發揮「內外夾攻」的多元處遇方法，協助受害人，覺察、脫離高壓控管關係。

希冀，透過阿靜的故事、以及高壓控管理論的光照，自詡為助人工作者的我們，在忙碌的工作中，能時時提醒自己，放慢腳步，懸置習而不察的視框，運用敘事的想像，貼近那些過去我們難以理解、甚至拒絕服務的案主。

謝 詞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者對本文之建議斧正，若尚有缺失之處當屬作者之文責。

參考文獻

- 王珮玲(2012)：〈臺灣親密關係暴力危險評估表(TIPVDA)之建構與驗證〉。《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6卷1期，1-58。
- 高鳳仙(1997)：〈論家庭暴力防治草案〉。《律師雜誌》，216卷，16-24。
- 現代婦女基金會北區工作站、王增勇(2015)：〈社工如何與高壓控管個案同行〉。現代婦女基金會主辦「104年度婦女人身安全實務研討會」(臺北市)實務發表之資料。
- 陳秀峯(2010)：〈台灣家庭暴力防治之現況與未來：從被害人保護及加害人處遇角度觀察〉。《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6卷1期，187-210。

airiti

潘淑滿(2003)：〈婚姻暴力的發展路徑與模式：臺灣與美國的比較〉。《社區發展季刊》，101卷，276-292。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2015)：〈家暴法修正案三讀通過 增列防止恐怖情人條款〉。2015年8月6日，取自http://www.mohw.gov.tw/CHT/Ministry/DM2_P.aspx?f_list_no=7&fod_list_no=5308&doc_no=48297。

Stark, E. (2007). *Coercive control: the entrapment of women in personal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hy Don't Victim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Leave? From Physical Abuse to Coercive Control

SHIH-YING CHENG

Purpose: The case report provides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the limitations of current social work treatments. **Methods:** Ching is a Taiwanese woman who suffered from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 from her husband. I narrate her story and help-seeking processes, particularly the difficulties she faced with intervention by domestic violence services. I reflect on her reluctant and fickle attitude toward me as her social worker in light of Evan Stark's coercive control theory, which emphasizes gender entrapment, privileged access, and social isolation. **Results:** As Stark's theory suggests, the control relationship made Ching a prisoner to her partner. She could not escape to seek help from the formal system. In Taiwan, the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hat aim to enhance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safety, such as protective orders and reporting to the police, are mainly judicial tools. Consequently, social workers and network members (e.g., the police) place greater emphasis on physical abuse than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controlling relationships. Stark claimed that tools that aim to enhance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safety are only useful short-term. I also found this to be the case for Ching. **Conclusions:** Unless the controlling and oppressive relationship that is depriving a victim of autonomy can be recognized, it is difficult for professionals to develop effective strategies that truly help victims lead an independent and free life. I hope this article can help practitioners rethink the nature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their strategies for helping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Key words: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domestic violence, coercive control

Shih-Ying Cheng: Former Social Worker, Modern Women's Foundation; Ph.D. student, George Warren Brown School of Social Work,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E-mail: shih-ying.cheng@wustl.edu)